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南下报人的多重身份与新马汉诗的演进

王 兵

摘要：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新马地区的华文报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一大批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下南洋的报人知识分子密切相关。他们在报社主要担任主笔、总编辑或副刊编辑等职务，形成了身份优势，对于汉诗发表平台的创设和诗人诗作的选择发挥重要影响或决定性作用。这一群体同时具备首位南下报人叶季允所言之“报中之我”和“报外之我”两种特质，在新马汉诗的生产 and 传播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就“报中之我”而言，进入媒介之中的报人既是汉诗发表园地的开辟者、汉诗创作风气的引领者，也是汉诗时事题材来源的提供者。另外，媒介之外的部分南下报人还兼具新马汉诗创作者和文学活动参与者的多重身份。总之，在这百年间，不同时期下南洋的报人知识分子见证和参与了新马汉诗的演进全程。

关键词：南下报人；多重身份；新马地区；汉诗

1881年12月，时任香港《中外新报》编辑的安徽人叶季允南下新加坡，接受海峡华人薛有礼的邀请，出任东南亚第一份华文日报——《叻报》的主笔职务，自此开启了中国报人知识分子下南洋的序幕。此后，《檳城新报》《星报》《天南新报》《南洋总汇报》《光华日报》《振南日报》《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明日报》等华文大报，以及《消闲钟》《夜灯报》《新力报》等华文小报纷纷创办，涌现出黄乃裳、徐季钧、邱菽园、张叔耐、林独步、李西浪、曾圣提、傅无闷、郁达夫、胡愈之、曾心影、胡浪曼、李星可、连士升等数百位南下报人。据考证，1980年2月从《南洋商报》退休的钟文苓是最

后一位南下报人，而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新马本土报人仅有曾梦笔、郑文辉、冯列山和莫理光等数位而已。^①因此，这百年间主持新马华文报政的核心人物几乎都是先前在国内办过报纸、做过编辑，或已声名卓著后因时局动荡等诸种因素谋生新马的南下报人。

南下报人的出身颇为复杂，有的是晚清科举文人和旧时洋场才子，有的是新文学代表人物，有的则为留学海外的新式知识分子。不过，这一文化群体也有鲜明的共同特征，即早年都

^① 参见杜南发：《报人的身影——郑文辉〈笑傲报林〉》，《联合早报》2020年5月7日。

接受过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皆热爱文字工作、文学创作以及中华文化。这些条件使他们在主政新马华文报章时,能发挥身份优势,积极开辟文艺副刊,并亲自投身创作,在个人诗文集出版相对困难的年代里甚至引领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华文旧体诗词或曰汉诗就是新马华文报章最早刊登的文学样式之一,也是新马地区新文学产生之前的主要旧体文学体裁。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新马报章汉诗即刊登于1887年12月19日《叻报》上的四首南游绝句,出自广东嘉应诗人张汝梅之手。另据新加坡学者李庆年统计,现存二战之前创办的22种新马华文报章皆刊载汉诗,且总数量高达五万首之多^①,占据新马汉诗创作的绝对主体地位。换言之,新马汉诗主要仰赖华文报章这一公共媒介进行大众传播。而在此过程中,华文报章的主笔、总编辑或副刊编辑毫无疑问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学界的研究,或侧重于新马华文报纸、报人和文艺副刊方面^②,或侧重于新马汉诗的发展演进^③,对于报章媒介与新马旧体文学关系的关注较少。

鉴于南下报人群体的复杂性,我们可以借用叶季允“报中之我”和“报外之我”的二分法来探析1881至1980年间大批南下报人在新马汉诗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报中之我,一我也;报外之我,又一我也。报外之我,不能移于报中,即报中之我,亦不能例诸报外。盖报外之我,为一己之我,权衡取舍,我自操之,非他人所得而强干。报中之我,为众人之我,一予一夺,必须屏去我之私臆,然后众人之我,说乃可行。”^④简言之,“报中之我”即指作为职业的媒体工作者角色,“报外之我”则系作为独立个体的文化人角色。这两种角色对新马汉诗的生产 and 流播皆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相对而言,作为“报中之我”的身份更能凸显出这一群体在新马汉诗演进过程中发挥的独特作用。尽管叶季允认为职业报人须秉持公心,摒弃“我之私臆”,但在报章定位、栏目开设、信息筛选等方面,那些主笔、总编辑或副刊编辑无疑会担任“决策者”和“设计师”的角色,在为社会大众提供知识与信息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利用传播媒介发挥着影响受众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的公共权

力。若依此观念审视新马报章中所载汉诗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从三个向度来作进一步考察。

一、汉诗发表园地的开辟者

早期新马报章上的汉诗是与社会新闻、告白等内容夹杂在一起的,并无单独的栏位归属和版面设置。1896年3月12日,《檳城新报》开辟了新马报章史上第一个汉诗栏位——“诗章附录”,刊登了当时在《檳城新报》任职的广东南海人何应源(号渔古)分咏老儒、老将、老农和老妓的组诗《四老吟》,并在其诗序中抒发了怀才不遇、前路迷茫的感慨。其后不久,1896年8月27日的《星报》亦出现“诗章附录”栏位,登载了署名酸道人的《戏题〈红楼梦〉十二钗》组诗。酸道人实际上是新加坡文化名人邱菽园的一个笔名。由于邱菽园有关《红楼梦》的诗作太多,《星报》连载了九期才刊完。不过自8月28日始,邱氏《红楼梦》诗歌登载的栏位名称并没有沿用“诗章附录”,而是直接以“《红楼

①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前言,第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蒙鹤:《早期新加坡华文报章与华人社会(1881—1912)》,胡兴荣译,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8;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王懋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社,1987;崔贵强:《新加坡华文报纸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1993;赵颖:《新加坡华文报刊研究(1887—1912):华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与演变》,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八方文化创作室,2021。

③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赵颖:《新加坡华文旧体诗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高嘉谦:《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 Bing Wa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Singapore: Witnesses to Social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7; 徐持庆:《马来西亚古典诗社发展史》,雪兰莪:文运企业,2023; Lam Lap,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The Writ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87-1945)*, Leiden, Boston: Brill, 2024。此外尚有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谭勇辉教授等撰写的系列论文。

④ 叶季允:《惺噩生绪言》,《叻报·社评》1906年9月18日。

梦》杂诗”“续《红楼梦》杂诗”等命名,这也说明“诗章附录”并不是一个常设栏位。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华文报章中比较常见,如1897年2月22日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即在常见的新闻栏位外,增设“诗文杂录”或“诗章附录”等。这类栏位通常只登载一位诗人的几首诗作,篇幅大小约占整个版面的五分之一,因为不是常设栏目,故版面位置和登载频率皆不固定,可视为其后文艺副刊的滥觞,其价值无法与社论、新闻等相提并论。诚如仙峤在《报纸副刊小史》中所言:“报纸上副刊的起源,最初不过在新闻余幅,附载诗词,或围墨轶事,用以补白,及聊助读者兴趣,所以标题总是‘文苑’‘余瀋’等类,有时刊载,有时不刊载,大家都以等闲视之。”^①

20世纪初,新马两大华文报纸都以附张形式开辟了副刊,正式开启了文学艺术独立于新闻之外的时代。1905年8月2日,《檳城新报》创设副刊《益智录》,包含诗词、小说、旧事谐谈、科学零拾、笑林、歌谣、丛谈、格致谈、联语、游戏文章、官场现象、传记和世界奇文等栏位。1907年1月16日,《叻报》正式加编《叻报附张》,内容包括游戏文章、滑稽辞令、黄州谈鬼、漆园寓言、辞赋诗歌和风谣俚曲等类。从栏位名称和内容来看,这两个副刊囊括了一切益智娱情的文艺形式,属于文艺色彩浓厚的综合性副刊。从副刊创设目的来看,兆吕《看看附张出世》认为副刊的最终目的是“助文明之进步”,理由是“自西风东渐,人群日尚文风,而洲而埠而岛靡不以报馆少为野蛮,报馆多为文明。无他,报纸者,所以广见闻、开智慧。言有补乎民俗,举笔直陈;事有败乎民风,当头棒喝。孰邪孰正,历历详言,故近来多有视报馆为依归,而本报不得不尽其义务,添设附张以助文明之进步”,相较于正纸上那些良士庄言,附张的“婉道微词,其感化之入人心者为最速也”^②。这种观点与总编辑叶季允的表述不谋而合:“蒙庄怪诞,悉属箴言,曼倩诙谐,都为谏。言中有物,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弦外留音,则月露风云,亦堪惊醒。况夫欲正俗者先求于俗,毕竟村讴里唱,最易感人。善进言者,每婉其言,是知妙句清词,亦堪风世。”^③概言之,《叻报附张》创设本意即利用诸种文艺的“箴言”“谏”“正俗”

和“风世”职能“以助文明之进步”。

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新马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或文艺色彩浓厚的综合性副刊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文艺副刊的价值逐渐凸显。马华作家方北方曾言:“一家日报必须有本身立论公正的社评,也应该有内容坚实的文艺副刊。如果说社论是日报的喉舌,文艺副刊应该是报纸的精神,其实也是报纸的灵魂。”^④随着副刊的不断出现,旧体诗词才在诸家报纸中寻觅到了相对固定的刊载位置,甚至有的报纸还开辟了全部登载旧体诗词的副刊。仅在1881至1942年间,新马华文报章中登载汉诗的副刊或栏位就有上百种,有代表性的如《叻报》之《叻报附张·文苑》《文艺栏》《叻报俱乐部·诗界》《椰林》《闲暇》等;《星报》之“诗稿附登”“诗章附录”“诗章就正”等;《檳城新报》之《益智录·词苑》《益智录·诗界》《益智录·词章》《益智录·文苑》《诗词专号》《无线电台》《大千世界》《东方花园》等;《天南新报》之“外人来稿”“来诗类录”“杂著附刊”“词人妙翰”等;《中兴日报》之《非非·词林》《非非·文苑》等;《总汇新报》之“文苑”“诗界”“诗选”“诗丛”“诗坛”和《工余读者》《总汇副刊》《社会花絮》《金马仑高原》《星期副刊》《日落》《谈汇》《世纪风》《都会》等;《光华日报》之《光华杂志》《帆声》《孔明》《朝霞》《顽石》《槟语》《槟榔》《光华》《国学》《爱逸意谈》《星期副刊》《灿烂》等;《南侨日报》之“文苑”等;《振南报》之“文苑”“诗界”“海天酬唱”等;《国民日报》之《国民俱乐部·文苑》《国民俱乐部·诗苑》《国民俱乐部·诗词》等;《益群日报》之“蕊珠宫”“诗选”和《晨光》《天声之籁》《一群》《益群杂志》等;《新国民日报》之《新国民杂志·诗界》《新国民杂志·

① 引自傅无闷编:《星洲日报周年纪念册》,第147页,新加坡:星洲日报,1930。

② 兆吕:《看看附张出世》,《叻报》1907年1月17日。

③ 叶季允:《叻报附张出世记》,《叻报》1907年1月16日。转引自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第10页,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因当日《叻报》有所毁损,此文今已不见。

④ 方北方:《马华文学及其他》,第51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新加坡文学书店,1987。

诗词界》《新国民杂志·诗歌》《星期茶点》《新园地》等；《南洋时报》之《荔》《海丝》《诗》《微光》《同善》《八月》《国学》等；《南铎日报》之《黎明》《读者俱乐部》等；《南洋商报》之《商余杂志》《狮声》《晓风》《吟哦台》等；《星洲日报》之《繁星》《游艺场》等；《中南晨报》之《咖啡店》；《星中日报》之《星海》《星宇》等。上述报纸的主笔和副刊编辑绝大多数都是南下报人，他们为那些汉诗作者的诗词作品提供了公开发表的平台。

在如此繁多的副刊名称背后，实际上都蕴含着每家报刊的理念宗旨和每任编辑的选择标准，而每一次汉诗园地的名称更动，都意味着办报理念与编辑标准的相应调整。当然，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很多，就其要者有三点：首先是汉诗创作数量的多寡。在新马华文报纸诞生的19世纪后期，底层劳工是华人移民下南洋的主体，能够进行汉诗创作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在此背景下，可供编辑们筛选的本地汉诗稿件自然就少，于是才会出现“外人来稿”“来稿照刊”的情况，《叻报》现存第一组汉诗源自过客文人，《檳城新报》登载的第一组汉诗来自主笔之手，也都是稿源稀缺使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降，诗文社团陆续兴起，新马地区文风稍振，稿源渐丰之后才会有“文苑”“诗选”之栏名，各报副刊编辑才获选择之权力。其次是编辑的个人喜好。一般而言，新马华文报纸的副刊版面囊括文学和艺术门类的多种体裁，旧体诗词仅占其中一个小类，刊登的频率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编辑对于诗词的喜好度。《叻报》上登载粤讴的数量远远大于旧体诗词，就跟主笔叶季允少时在番禺生活，喜好粤地戏曲文化和说唱文学密切相关。1899年创刊的《日新报》，其前身是发表大量旧体诗词的《星报》。尽管在其报社“告白”中亦云“外来论说、新闻，以及诗、词、歌、赋，务求有益于世，无损于人者，方敢照登以副盛意”^①，但实际上，在《日新报》发行的近三年时间里，仅有三首转载自国内的旧体诗作，本土汉诗作品阙如。究其缘由，除却对外采稿的审慎态度之外，主编黄乃裳对于诗词不太感兴趣应该是主要原因。再次是新文学的巨大冲击。受到中国国内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马地区的华

人知识分子也在南洋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文学革命运动。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发刊词云：“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并且也不太合时宜。”^②该副刊积极提倡白话文，并身体力行刊登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精神的语体散文”，被称为新马华文新文学的起点。而实际上，《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张叔耐却是个旧体文学的爱好者，此副刊登载的旧体诗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当时同类报刊难以望其项背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新文学已是大势所趋，多数副刊虽仍有部分文言作品刊载，但数量明显下降。

二、汉诗创作风气的助推者

新马近代华文报刊在提供汉诗发表渠道的基础上，还利用主笔、总编辑或副刊编辑的专业行为与声望人脉等文化资源助推或引领汉诗的创作风气，如登载诗文社团的课题、课榜以及优秀作品助推社团发展，发起征联征诗活动联络广大文友等。这些做法一方面源于那些南下报人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同时亦有副刊编辑与文学作者相互成就的客观因素。

19世纪末，为了在南洋流播文教，开化民智，晚清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总领事黄遵宪陆续创办会贤社、会吟社和图南社，定期举办社课，切磋诗文技艺，旨在提高侨民的文化素养。由于两任领事与《叻报》主笔叶季允关系密切，因此，会贤社自1887年8月至1889年6月、图南社自1892年2月至1894年4月的所有课题皆刊载于《叻报》上。^③待黄遵宪离任之后，寓居星洲的晚清举人邱菽园接续了前贤流播风化的使命，创立“丽泽社”，后扩充为“乐群文社”。其《五百

① 《本报更始告白》，《日新报》1899年10月6日。

② 张叔耐：《新国民杂志》发刊词，《新国民日报》1919年10月1日。

③ 参见汪鲸：《适彼叻土：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新加坡华人族群（1819—1912）》，第141—14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石洞天挥麈》有载：“丙申（1896）余来星坡，蒙内地流寓诸君子委校文艺，继左、黄二领事会贤、图南社后，创兴丽泽一社，以便讲习。……南荒僻陋，岛屿林立，流寓文士散而不聚，声气难通；土著人材童则失于正蒙，壮则溺于货利。求有一二心通其意，思能洽我同源、响我宗教者，已戛戛难之，况求其干城我、金兰我耶？”出人意料的是，丽泽社的初课就得到了南洋文士的踊跃响应，“一时闻风奔辏，得卷千四百有奇”^①。

这种现象至少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左秉隆和黄遵宪先前的文化普及工作虽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也确实提升了一部分本地侨民的文化修养，为丽泽社的初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其二，丽泽社的社课录取卷数与奖金都远超会贤、图南二社，丰厚的物质奖励也激励了一部分侨民的创作热情。会贤社每期录取卷数仅有15个名额，且按等次分享总领事捐出的10元。^②图南社每期录取人数是21至65名，分为超等、特等和一等三级，赏银由黄遵宪与当地绅商捐助，每位赏金多则5元，少则2角，总奖金为20元至40元。^③邱菽园则因继承了富商父亲的百万家产，加之个性豪爽，热衷于发扬中华文化，故给予丽泽社的奖赏也非常慷慨。每期的名次谢款，冠军12洋元，殿军6洋元，其余则视投卷数量而酌定，分为若干等级，每级又列若干名额，第一等第二名至第五名奖赏2至5洋元，其余等级则为1洋元，或另附赠文房书籍。^④

丽泽社主要活跃于1896年10月至1901年间，前期的课题、榜单及获奖作品主要刊载于《叻报》和《星报》，1898年5月之后才转入邱菽园创办的《天南新报》。据学者们统计，在扣除重复名号外，左秉隆之会贤社实际得奖人数为291人，黄遵宪之图南社实际得奖人数为391人，会吟社得奖者至少146人（最后两期未公布获奖名单），邱菽园之丽泽社则有692人。^⑤值得注意的是，《星报》在刊登会吟社联榜时，除获奖卷数之外还注明收到的参赛卷数。平均而言，每期收到的作品数量是获奖数量的5倍左右。若以此估算，则19世纪末新马地区的诗文作者已达3000余人。这种景象固然有左秉隆、黄遵宪和邱菽园等人的巨大功劳，同时也离不开《叻报》《星报》主笔和编辑队伍的全力助推。

《天南新报》的创立，意味着儒商邱菽园正式开启了他跌宕起伏的报人生涯。自任社长和主笔的邱菽园并不满足于利用《天南新报》这个平台发表丽泽社社员的诗词作品，还主动发起征诗和题咏活动吸引大量流寓诗人和外地诗人的积极参与，引领汉诗创作风气。1897年12月，邱菽园以乐群文社之名发起了客云庐征诗活动，客云庐即邱氏用来接待外地诗友的寓斋之名。起初，邱菽园拟将所征之诗结集刊刻，但最终并未如愿，那些诗词作品自1898年11月17日起陆续刊登在《天南新报》之“杂著附刊”栏，径以“客云庐诗略”“客云庐诗征”“客云庐诗录”“客云庐诗词征”“客云庐诗词录”为名。作者群体主要包括丘逢甲、王恩翔、潘飞声、李芷汀、林丰年等外地诗人，以及黎经、林筠台、谢静希、张汉祥、林鸿荪等流寓诗人。在征诗活动的同时，邱菽园还发起了数次题咏活动，具代表性的有《天外归舟图》题咏、《红楼梦》绝句题咏、《风月琴樽图》题咏和《选诗图》题咏。^⑥题咏的诗作皆刊载于《天南新报》上。类似的活动一方面有效地激发了早期新马地区的创作热情，促进了不同区域诗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提升了报人邱菽园在当时文坛的影响力。1925年，邱菽园接任《南洋商报》副刊《商余杂志》的编辑，也非常支持新加坡檀社和马来亚麻坡天南吟社的活动，《商余杂志》俨然成为两个诗社作品发表的公开园地。

邱菽园利用自己的报人身份结交了一批海内外的知名诗友，提携了一批本土的诗人新秀，

① 邱菽园：《五百石洞天挥麈》卷二，1899年粤垣雕刻木板大字本，又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第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② 详见《会贤社月课课榜名录》，梁元生：《宣尼浮海到南洲：儒家思想与早期新加坡华人社会史料汇编》，第33-4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5。

③ 叶钟铃：《黄遵宪与图南社》，《亚洲文化》1991年第15期。

④ 详见《丽泽社第二期谢教录》，《星报》1896年10月31日。

⑤ 参见谭勇辉：《星洲丽泽社与南洋诗坛》，《马来西亚汉学刊》2018年第2期。

⑥ 详参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第143-14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对新马地区的汉诗创作贡献良多。当然在此过程中,邱菽园的知名度也随之水涨船高。1934年,当他和林文庆等人创办旨在复兴中华之学、寻找文化之根的“南洋崇儒学社”时,汉诗创作亦是其中一环。当年的《南洋商报》详尽报道了“崇儒学社”诗钟比赛的盛况,社员踊跃参赛,“计共八百六十卷,请邱菽园先生评取四十五名”^①。这时的邱菽园虽已不在报社任职,但他在汉诗创作领域的成就足以让他完成从报人编辑到专业评审的身份转变。

受到社会大环境和新文学的影响,汉诗创作风气在二战以后逐渐衰落。报纸副刊虽然门类繁多,琳琅满目,但是给古典诗词的栏位却越来越少,与文学社团有关的信息则直接登载于本地新闻版。不过,社团雅集作品的传播路径除了本地华文报纸副刊登载以外,又增加了出版雅集特刊和投往海外期刊两种渠道。如新加坡新声诗社在近两年的筹备注册过程中,诗社同仁召开多次会议,并通过《南洋商报》新闻版向社会公布相关进展,同时亦发布雅集信息。^②其早期雅集作品汇成特刊出版者有《丁酉诗人节双林寺雅集特刊》(1957)《戊戌诗人节雅集纪念刊》(1958)《新声诗社辛丑端阳雅集丹絨禺特刊》(1961)等。不过,仍然有刊载于报刊的情形,如1959年“戊戌诗人节雅集”诗作刊登于台湾《亚洲诗坛》第1卷第3期;1960年的“庚子诗人节雅集”产生的38首诗歌则全部载于《南洋商报》。值得称道的是,该社秉承早期的社课传统,至今仍弦歌不辍。社课作品除了刊登于《南洋商报》的副刊《商余杂志》之外,有25期刊载于1971至1973年的《新明日报》,当与其时的总编辑钟文苓有关。新声诗社最为兴盛的20世纪50至80年代,正好与东南亚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存废时间重合,南洋大学爱好诗词的教授、学生亦参与新声诗社的雅集活动。^③可以说,南洋大学的刘太希教授、黎国昌教授、黄勖吾教授和大学秘书长潘受等,与新声诗社的核心成员曾心影、李俊承、叶秋涛、谢云声、蔡寰青、陈宝书、方焕辉、马宗芎、许乃炎、张济川等组成了那个时期新马汉诗队伍的中坚力量。

另外,华文报社不定期组织的各种征诗比赛也在某种程度上活跃了本地汉诗的创作风

气,如《星洲日报》1959年初主办的春节征诗比赛活动,就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本报为提倡文艺,增进爱好诗词者雅兴,举办春节征诗比赛,以‘星洲日报’为题,消息传出,各地骚人墨客踊跃应征,文稿如雪片飞来,旬日间收到作品一千三百余篇。”^④作者以新马两地为主,特邀请南洋大学中文系涂公遂教授、国学名家王震教授、前《星洲日报》主笔胡浪漫和现任主笔廖颂扬作为评鉴者。最终评出冠、亚、季军各一名和荣誉奖十名,且有丰厚奖金。

从上述的脉络梳理可以看出,新马汉诗不论在19世纪末的发轫期、20世纪上半叶的繁盛期,还是20世纪中叶之后的衰退期,每一次汉诗创作风潮的兴起都离不开华文报章及其报人群体的助推与引领。

三、汉诗时事题材来源的提供者

19世纪末,早期移民南洋的华人知识分子在诗歌题材的选择上多以交游唱酬、写景抒怀和家国之思为主,这一方面秉持了中国古典诗词“兴观群怨”的职能特点,同时也是迁居异地的新移民在文化适应阶段重点关注的创作主题。实际上,不论处于哪一时期的第一代南下诗人,其作品中皆不乏具有热带雨林气候特征的南洋风物、与流寓或本土文人的诗词交往,以及思念亲人、家乡与故国之情等内容。即便当时晚清发生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重大事件,新马华文报纸中却鲜有反映此类时事的汉诗发表,与新马地区相关的重大时事亦概不例外。比如,

- ① 《南洋崇儒学社诗钟月圆会(二):第一次征诗揭晓》,《南洋商报》1934年3月2日。
- ② 《南洋商报》1958年6月23日、7月21日、8月18日和1959年4月4日分别有《端阳节诗人雅集大会筹组“新社”改称“新声诗社”并推举筹备委员多人》《新声诗社举行首次筹委会议通过要案多宗订下月中召开发起人大会》《新声诗社章程草案通过进行申请注册》与《新声诗社注册获准》的报道。
- ③ 参见张玉:《论新加坡新声诗社旧体诗词中“中国意识”的转变——以1957—1985年端午“诗人节雅集”为例》,《马来西亚汉学刊》2018年第2期。
- ④ 《本报主办春节征诗比赛,首选佳作评定》,《星洲日报》1959年2月18日。

北洋水师 1894 年 3 月 3 日访问新加坡,《星报》首先对此事进行报道:“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禹廷军门汝昌统率定远、靖远、来远、经远四兵轮,于(阴历)二十六日午后三点余钟抵叻……旅叻华人,为工为商,无老无少,莫不争先恐后,麇集海滨一带,欣瞻宗国之旌旗,其民情概可想见。”^①3月9日,晚清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宴请北洋水师官兵,次日《叻报》便在首版显著位置刊文纪盛。^②图南社亦以《丁军门统率战舰南巡记》为当月社课文题,《星报》在次月即刊登社课头名徐亮铨的文章。^③而以此为题材的汉诗创作,却只有时任《星报》主笔何应源的一组七绝而已。^④

维新变法事件在新马华侨界亦引起广泛关注,《叻报》《星报》《檳城新报》《天南新报》等早期华文报纸都有社论,或主张维新变法,或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结党惹事。不过,反映维新变法运动史事的汉诗却寥寥无几,仅在戊戌六君子被害后《天南新报》刊载了一些外地诗人的诗作。学者李庆年将其原因归结于“当时诗坛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叶季允、左秉隆并无以身作则,创作以时事为内容的作品”以及“发表的园地有限,即使有时事内容,还得经过主编审阅批准”^⑤。然而,在对比新闻报道、记体文和诗作的比重之后,可以看到其核心原因在于早期华文报纸对于诗词文体的功能定位更倾向于个人化的“兴观群怨”,而“经国之大业”的职能则交由文章来完成。

20 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几年间,新马地区的两大华文报纸——作为保皇派机关报的《总汇新报》和作为革命党机关报的《中兴日报》,围绕晚清政治局势和中华民族存亡等重大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据学者统计,自 1907 年秋《中兴日报》创办伊始到 1911 年底,两大华文报纸的主笔和支持者发表的与论战有关的政论文就有 391 篇。^⑥《总汇新报》早期的主笔主要由康有为弟子担任,如徐勤、欧榘甲和伍庄等保皇会骨干。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吸引了不少守旧势力的追随者,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亦有鲜明体现。这一时期的《总汇新报》除了刊登颇具南洋特色的竹枝词外,主要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诗作,以及支持立宪、保皇气息

浓厚的诗词作品。如郑世琛《去岁闻颁国会年期喜赋一律寄伍君用卿》:“南方商界团初结,国会遥闻大陆东。廿世纪为新国史,擎天事业望诸公。”^⑦《中兴日报》是继《图南日报》之后革命党人创办的另一份报纸,创办人陈楚楠和张永福分别是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正、副会长,主笔田桐一方面用社论与《总汇新报》打笔战,一方面作旧体诗挞伐那些主张立宪的保皇党人:“保皇政策已成空,立宪还教末路穷。愧我忠臣偏堕落,任他革党骋豪雄。”^⑧

至 20 世纪 30 年代,祖国大陆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新马华人华侨不仅捐款捐物支持抗战,还利用报章社论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抗日战争时期,新马各大华文报纸副刊登载的汉诗虽不乏消闲酬答之作,但抗日题材和主题明显占据优势。诚如李庆年所言:“在民族危机出现时,许多诗人表现了敌忾同仇的精神,而大部分的诗作都和抗日有关,这是马华旧体诗有史以来与时代关系最密切的一次。”^⑨如《总汇新报》之《总汇副刊》,自 1937 年始集中刊登反映中国时事和星洲本地时事的竹枝词;邱菽园在其主编的《星洲日报》之“游艺场”连载自己创作的百余首“抗战韵语”竹枝词;《檳城新报》晚版之《大千世界》本以提倡趣味和消闲为宗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汉诗作品则多与抗战有关;《南洋商报》副刊《商余杂志》的“吟哦台”栏目虽诗作不多,但几乎都与抗日题材有关。可见,重大时事改变了部分新马华文报纸原先设

① 《中国兵轮抵叻》,《星报》1894 年 3 月 5 日。

② 《寓叻闽粤商公宴丁禹廷尚书暨诸战船管驾及麾下诸将官纪事》,《叻报》1894 年 3 月 10 日。

③ 徐亮铨:《丁军门统率战舰南巡记》,《星报》1894 年 4 月 12 日。

④ 何应源:《丁军门禹廷统带战舰南巡,于二十六日到叻,赋此纪盛》,《叻报》1894 年 3 月 6 日。

⑤⑨ 李庆年:《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881—1941)》,第 81—82、487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⑥ 参见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附录,第 193—211 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⑦ 《总汇新报》1909 年 2 月 10 日。

⑧ 恨海(田桐笔名):《吊保皇党》,《中兴日报》1908 年 6 月 20 日。

置的副刊定位,除此之外,也暂缓了当时新马文学本土化的进程。

20世纪30年代,新马华文旧体诗的发展遭遇了双重困境。一方面,新文学的冲击来势汹汹,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愈加强调文艺创作的南洋色彩,旧体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不过在全体侨民声援祖国抗战之时,新马华文报纸还是登载了不少抗日题材的优秀汉诗,如陈修礼纪念“九一八”事件的诗作云:“关外笳声关内忧,玉楼歌舞即时休。春雪已被秋云卷,清水化为血水流。万里烽烟悲国难,七年鼙鼓起边愁。南山放马知何日?束矢归来报世仇。”^①姚楚英纪念卢沟桥事变的诗作曰:“浩劫中原空古今,两年血债付长吟。芦沟桥畔凄凉月,常照千秋烈士心。”^②另一方面,1939年7月,英日两国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表明英国在中国问题上单方面向日本妥协,这份协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英国殖民政府对新马华文报章的抗日言论及其艺术作品进行严格管制,直接导致新马文学一度进入低潮期。即便如此,新马华文报纸依然会用变通的方式登载抗日诗作,如1940年太虚法师率领中国佛教代表团出访东南亚诸国,4月初抵达吉隆坡时发表了一首赠锡兰(斯里兰卡)最胜比丘的次韵诗,其中“邻魔肆虐方侵掠,众苦为缘抒悯悲。中锡更欣文化协,快将世界大同期”两联^③,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以及希冀世界和平大同的美好愿望。

事实上,新马汉诗作者对于上述重大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和影响等信息的获取,除了过境文人的转述外,基本来自新马地区的华文报纸。作为接触国内、国际时事信息最为便捷迅速的主笔、总编辑或副刊编辑们,他们对于重大新闻事件的关注程度以及价值判断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诸家报纸的阅读受众,自然也包括那些古典诗词的创作者们。从这个角度而言,由于获取信息存在时间差,所以新马华文报章的主体内容——新闻报道往往成为新马汉诗作者创作时事题材诗歌的直接素材。

除了来自祖籍国的时事政治新闻外,新马华文报章中的西方时事亦成为新马早期“新派诗”的表现题材。如邱菽园1940年创作了一首

关于托洛斯基(Leon Trotsky)遇刺身亡的诗:“新国功成感异谋,频年亡命寄他洲。可怜卒死门徒手,防友难于御血仇。”^④托洛斯基是苏俄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十月革命指挥者和苏联红军缔造者,是一名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和作家。列宁死后他被排挤出苏共领导核心,后流亡海外,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刺杀于墨西哥。我们翻阅本地的报纸发现,自从托氏流亡之后,《南洋商报》就有颇多报道和评论,甚至在1937年2月就传出斯大林欲派人至墨西哥行刺托洛斯基的消息。^⑤他曾有两次遇刺的经历,新马华文报纸如《南洋商报》等多次登载引述路透社的新闻报道。^⑥

当下学者在解读晚清“新派诗”时,多强调其在中国旧文学到新文学转变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较少深入分析“新派诗”的产生与现代传媒之间的互动关系。新马时事类题材的汉诗创作实践,同样证实了现代传媒与“新派诗”的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前者为后者搭建了一个发表的平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现代报刊中报道、译介或评论的西方各类新闻事件或涉及的西方文化恰恰是旧体诗人创作“新派诗”素材的主要来源。

余论

早期下南洋的移民群体中,识字能力较低的劳工阶层占据主力,精通文墨者则主要集中于领事官员、儒商、教师、报人、中医师和少数僧人。其中,南下报人在报社本职工作之外,业余

- ① 陈修礼:《九一八纪念感书》其一,《新国民日报》1938年9月22日。
- ② 姚楚英:《七七二周年纪念感赋》其一,《星中日报》1939年7月2日。
- ③ 太虚:《四月二日抵吉隆坡陈慧肇居士献诗次韵即赠锡兰最胜比丘》,《星中日报》1940年4月5日。
- ④ 邱菽园著,王盛治、邱鸣权编:《丘菽园居士诗集》二编,第24页,1949年铅印本。
- ⑤ 《传史太林派人至墨行刺托洛斯基,托氏居宅已戒备》,《南洋商报》1937年2月6日。
- ⑥ 《托洛斯基在墨西哥京城遇刺未死,行刺者开射机枪》,《南洋商报》1940年5月26日;《托洛斯基遇刺,伤势严重无生望。凶手为一法籍犹太人,现已被捕》,《南洋商报》1940年8月22日。

时间还扮演着独立文人的角色。与其他职业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推动与传承中华文化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功能,只是在报人身份的有利条件下这一群体的功能发挥更显优势。具体到新马汉诗的演进而言,“报外之我”的报人群体既是汉诗的传播者、审阅者,同时也是重要的汉诗生产者,诗社创立、雅集活动的重要推手和参与者,以及新马早期文化空间的拓展者。

报人和诗人的最大交集就是二者都是语言文字工作者,只是前者更侧重于新闻报道和评论,后者则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因此单从概率而言,报社的主笔或总编辑未必会写旧体诗词,文艺副刊的编辑同时也是一位诗人的比例则相对较高。当然,这一规律不一定适用于20世纪前后下南洋的知识群体,因为他们早年在中国接受的传统教育足以达到赋诗填词的水平,只是如《叻报》主笔叶季允等人谨守“报中无我”之分际,不太愿意在自己的报纸上登载个人诗作而已。用陈育崧的话说:“叶季允先生不但是南洋的第一报人,也是南洋的一代诗人。他能诗而不以诗鸣,他所写的诗,在《叻报》发表的,寥若晨星,屈指可数。”^①尽管叶氏诗作多半散佚,陈育崧仍辑得《永翁诗存》135首。而在新马多家报社任过职的何应源和邱菽园等报人,在社论写作之外,亦主动在自家报章上以汉诗为媒,交友唱酬,拓展交际网络。20世纪20年代以降,南下报人群体中善诗词者甚夥。如《新国民日报》主笔兼总编辑张叔耐,常在《叻报》“俱乐部”“谈丛”等栏目发表古文和旧体诗,被学者杨松年誉为“旧文学好手,但他同时也是新文学倡导的前锋”^②。《星洲日报》总编辑胡浪漫,多以御敌卫国为题材,发为豪宕凌厉、激昂高亢之音,著有《慧园诗存》。《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主编郁达夫不仅大量刊载新马本地诗人的作品,也登载了不少诗友之间的唱和之作。《叻报》总编辑兼《消闲钟》主编李铁民,作《星江杂咏》竹枝词三十首,其与著名报人傅无闷等人在日占时期的唱酬之作收录于郑光汉所编《兰花集》。

与此同时,这些南下报人兼诗人还积极参与新马地区各大诗歌社团或诗人雅集的活动,

如曾在《叻报》《天南新报》任职的徐季钧、曾在《槟城新报》《星报》任职的何应源等都是丽泽社的重要成员,并参加了邱菽园组织的多次雅集活动。更有甚者如曾心影,在担任《南洋商报》主笔期间,与一众文人雅士在1957年端午诗人节雅集公议筹组“新社”,翌年改名为“新声诗社”,并被推举为首任社长。新声诗社一直延续至今,为传承中华古典诗词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另外,新马学术研究机构南洋学会的成立,也与1938年底成立的《星洲日报》纪念刊《星洲十年》编委会的大力推动密切相关,涉及的成员有《星洲日报》总编辑关楚璞、文艺副刊主编郁达夫、《星洲日报》总编辑钟介民、《星洲日报》地方版编辑张匡人等。南下报人利用自身声望和专长推动了新马当地诗社、学会的成立,不仅拓展了新马早期的文化空间,也有效促进了汉诗的发展与研究。

总之,晚清以降数以百计的南下报人不仅利用报章平台将诸多诗人的个人化写作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促进汉诗在新马的广泛流播,同时利用媒介的公共权力助推和引领了新马汉诗的创作风气,积极拓展当地的文化空间。当然,报章自身刊载的新闻报道和社论等信息又成为汉诗作者时事题材新派诗的主要素材来源,甚至还有不少报人兼具诗人身份,深度参与新马汉诗的演进全程。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南下报人在新马汉诗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文系教育部“春晖计划”合作科研项目“华文传媒与新马汉诗演进研究”(HZKY202202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兵,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新马汉诗和华族戏曲。

① 陈育崧:《南洋第一报人》,第13页,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

② 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主编:《五四文学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45页,台北:学生书局,1990。